

【思想文化】

学术原因是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

王有红

(西北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学术原因,文字狱等的影响尽管很大,但并没有决定乾嘉汉学的性质,这一事实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关键词:乾嘉汉学;文字狱;实学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3-0006-03

On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Prosperity of Han School of Qian-jia Period in Qing Dynasty

WANG You-ho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prosperity of Han school of Qian-jia period in Qing dynasty was learning cause. Though literary inquisition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learning activities, it did not decide the core of Qian-jia period in Qing dynasty. Thi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by learning field.

Key words: Qian-jia Han school; literary inquisition; practical learning

学术界大多认为乾嘉汉学的形成是由于清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和文字狱,严重危及士人的生命,导致读书士人只好一头扎进“故纸堆”里,潜心学术。也有人认为乾嘉学派是乾嘉盛世的产物。也有学者论及乾嘉学派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学术发展逻辑,但语焉不详。但从根本上讲,学术发展原因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文字狱等的影响尽管很大,但并没有决定乾嘉汉学的性质,这一事实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一、文字狱的影响有限

首先,文字狱对清代朴学的形成影响有限。所谓文字狱,是指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和其他人群因诗书文字触犯禁忌,而被滥施刑律,史称文字狱。尽管它是针对知识界的,但它却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甚至后来演变为朝廷的权力斗争,所以它对学术

界的影响是部分的(部分人群或部分地区)。

(一)文字狱主要打击三方面的人

1. 对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的这一段历史进行编辑乃至收藏的人,清廷往往滥加诛戮。康熙二年的庄廷钺《明史》案,即属此类。

2. 宣扬不利于清廷统治的言行,号召反清复明的人,清廷势必以暴力打击。康熙50年(公元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6年(公元1728年)的吕留良案,即属此类。

3. 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屡屡有朝廷大员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雍正4年(公元1726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雍正10年(公元1732年)的谢济世注《大学》案等,尽管罪名不同,但都是借以打击政敌的。而且几乎每次文字冤狱,都会牵涉朝廷官员,弄得朝廷官员人人自危。文字狱打击地区大多集中于江南地区,由于古代社会的信息传递不畅,北方的

收稿日期:2003-06-16

作者简介:王有红(1978-),男,陕西合阳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博学鸿儒自然不会感到岌岌可危。

(二)文化分层

从文化分层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适合自身存在的文化,学术界的儒士有其自身的士文化,封建官僚阶层自然有其为官之道。

文字狱并不是完全针对学术界的,主要是针对反清及影响社会稳定的人群,它属于政治层面的行为,目的在于控制社会人群的思想自由,服务于其统治需要,并不是要压制学术。实际上,清代历朝帝王都强调文以载道,吸纳博学鸿儒,开科取士,拉拢士人,通过开馆修书,吸引学者,以彰显其文治武功。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众所皆知,清代仍旧以程朱理学为官方上层建筑,历代帝王都强化学教育,推崇程朱理学,甚至“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攻之”(《曝书亭集·道传录序》)^[1]。但是理学并没有像清代帝王期望的那样兴盛起来,相反,属于学术边缘的汉学却发展的如火如荼。这说明清政府的政治引导(甚至文字狱)并不能代替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相反,过度的政治引导,也易在士人心中产生逆反心理,从而使得士人对理学进一步厌恶,导致汉学在一定程度上兴盛。可见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并未受文字狱的影响。

二、晚明清初的实学是乾嘉汉学的先驱

晚明清初的实学是乾嘉汉学的先驱。在晚明,程朱理学已走向式微,陆王心学本是为了适应晚明危机的挑战,但士大夫却空谈心性,不能挽救政治和社会危机。因此,便出现以恢复和弘扬儒家经世传统为宗旨的实学思潮。晚明实学思潮先由学术界发其端绪,随后波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并且强调道德践履,对明清之际的思想界产生极大影响。

晚明实学思潮特征之一即在于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反对空谈误国,提倡事功之学。东林学派批判王学末流入禅的“空言之敝”,以昌明儒道要旨。高攀龙就认为,无“真功者”,就没有真正的学术;顾宪成也指出只有“躬行”实践,才是解决理学空疏的良药。特征之二在于士儒在对理学进行理论批判的同时,举起了复古主义大旗,用古代实证方法来研究学术问题,影响了整个学术界。万历年间,明代文学复古浪潮高涨,“拟古”“范古”之风尤盛。学术领域,儒者研究的重心也从“四书”转向“五经”,回归传统经学本位。晚明以张溥、张采为代表的复社士子,针对“士子不通经术”之风,从学术“务为有用”出发,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主张以考辨的方

式,实证的态度,树立求真的学风。晚明学术的复古主义倾向,表明理学的没落,用实证方法批判理学,也表明理学向清代汉学转变出现萌芽,考证的方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这给以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的“言必证实,言必切理”的重实证、重实践的学风以深刻影响。

清初诸儒,继续倡导经世致用和批判理学空疏。顾炎武首先批判理学,指出晚明的理学不是经学的本真,所以主张应以汉人治经为入手处,考辨求真。黄宗羲也批评王门后学的空谈,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同时,他也赞赏汉代经师的训诂考证之学。如果对理学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显然缺乏说服力,所以继起的阎若璩、胡渭则重点用考据法证明理学错误,表彰汉学。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推翻了程朱理学存在的理论依据,给理学以沉重打击。同时,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关心国是,抨击弊政,主张革新;学术上,同样提倡经世之学,黄宗羲“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顾炎武“以复古作维新”;傅山主张“思以济世”、“学必有用”;浙东张履祥倡导“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经济之学”;关中李颀提倡“识心悟体,实证实修”以“明体”、“开物成务”以“适用”的经世学说;颜李学派的“习行”主张,更是强调身体力行,成为我国早期的实践论者。

概观晚明清初实学思潮,它在思想上围绕经世致用思潮,手段上以复古为主,方法上倡导实证,目的是批判理学、革新政治。当然这一时期,学术还表现为汉宋杂糅态势,他们试图摆脱宋学的羁绊,以昌明汉学,但往往在表彰汉学的时候,又自觉不自觉的运用了宋学。正如章太炎对清初诸儒评价说:“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杂糅宋明调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2]这也正说明清初的实学思潮正是理学与清代汉学之间的过渡形态,清儒必定会沿着清初诸儒的学术道路继续前行。

三、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

至乾嘉时,清代文字狱达到疯狂的程度,暴力之剑高悬,士人们的学术研究当然会有所顾忌,但不应将其过分看重,文字狱只不过加剧了明末清初学术思潮中的复古主义倾向。

由于受清初实学思潮的影响,学术上的考辨之风尤盛。乾嘉汉学,大体可以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惠栋曾感叹宋元以来

汉学沦亡,遂以复兴汉学为己任,以古字更易所谓俗字,曾订正《易经》70 余字,对易学尤精。皖派戴震治经主张由训诂入手,把文字训诂作为治经的门径,治经主张从《尔雅》入手,反对主观臆断。其著作主要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方言疏证》等,在学术界影响很深。乾嘉汉学的集大成者阮元,认为治经从考据训诂入手,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他的巨著《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全面总结了乾嘉汉学的成就,为汉学的兴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儒家的经世传统,并没有因乾嘉汉学的盛行而消亡,倒是众多汉学大师主张义理与辞章并重,推行经世之学。惠栋提出“明堂”论;钱大昕治经主张义理与训诂相结合,且注重对义理的发挥;戴震指出社会“以理杀人”,汪中提出女子许二嫁主张;阮元也主张义理与考据统一。总之,乾嘉汉学家不但重视考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关注社会,对封建制度的弊端有所认识,提出了自己的经世主张。

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表现为学术的自我更新,自我否定,自我前进。梁启超在论及学术发展规律时说:“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兴而弊,而反动亦然。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3]。晚明理学“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猖幻至此,势故不得不有所因革。”^[4]而清代学术“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5]。余英时曾指出,归返原典(return to sources)是思想史上的普遍现象,“并不仅中国儒家为然”。又引汤用彤所言“大凡世界圣教演进,如至于繁琐失真,则常生复古之要求”^[6]。清初诸儒乃至乾嘉学派皆以批判理学为己任,在学术思想上倡经世致用和无证不信的学风。在学术方法上,他们都继承了晚明的复古主义作风,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重考据训诂,“凡立一意,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而且“孤证不为定说”^[3]。之所以尚古,既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系,也在于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依旧未发生显著变化,自然经济得

以延续,中西文化交流几乎停滞,所以士人们无法找到批判理学的武器,只好在传统文化里寻找,古老的汉代经学担负起了批判理学的重任,这就为乾嘉汉学的兴盛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汉学的盛行,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诸如:汉学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士人治经不重视对经的古音古训研究,使得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章制度混乱不清,不辨经书真伪,造成随意阐经,出现种种讹误,甚至有的已无法读懂。所以惠栋等乾嘉学者都主张从训诂入手释经,从而使得无法读懂的著作,成为可读之物,而且又使得以音韵、训诂为特征的小学逐渐脱离经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再如它的兴盛也与清代历代帝王不断主持修书有关。清代是我国中央主持修书最多的王朝之一,从康熙到嘉庆,重要的官修书有《御定数理精蕴》、《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等。每次修书,必然会聚集众多的学术大师,他们本着求真求是的态度,在众多图书中,辨伪存真,博物考古,以求无所纰漏。他们的学术态度及方法必然深深影响着清一代的学术,对中下层的士儒学术修养具有某种程度的引导作用。再如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以古为美,以古为尊,这与清代汉学的复兴也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乾嘉汉学的兴盛有诸多的原因,但其最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它的萌芽与兴盛,乃是晚明学风与清初实学思潮的产物。

参考文献:

- [1] 朱彝尊.曝书亭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2] 章太炎.诂书(重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5]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责任编辑:杨彬智]